

# 《入关》：“清兴”是“明亡”的重要推手



回溯明末清初的历史，今人大多站在明朝的视角来诠释明亡清兴的原因，结论无非是明朝自身出了问题，诸如昏君、阉祸、党争、民变……是这些内部原因导致明朝的灭亡。却很少有人以清朝的视角来诠释明亡清兴的原因：建州女真的势力何以逐渐坐大？八旗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八旗军的战力究竟如何？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有着怎样的个人才干？……这些问题不仅与清

朝的崛起密切相关，同时也是推动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其重要性并不亚于明朝自身的原因。张明扬认为这是一种自大的历史观，他称之为“明朝中心主义历史观”，正是有感于这种历史观，他写作了一部清朝视角的史著《入关》，以清朝的视角重新解读明亡清兴的历史。

熟悉清史的读者大抵都知道，努尔哈赤是靠十三副铠甲起家的，他之所以能够带领建州女真在列强环伺的环境中迅速崛起，主要是因为他做了以下几件事情：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击败明朝的围剿，创立八旗制度，制定抚蒙政策，继而席卷辽东，并在辽沈之战中完胜明军。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伐明，自然是虚应故事和欲加之罪，但他能够在伐明战争中一度势如破竹，却是韬光养晦、筹划多年的结果。努尔哈赤的继任者皇太极也是同样，他不仅及时纠正了努尔哈赤执政后期滥杀辽人的恶政，且一手攻明，一手集权。正是在皇太极执政期间，由孙承宗和袁崇焕所主导的，明军精心构筑的宁锦防线、引进的红衣大炮和以辽人守辽土的战略，均被后金悉数破解。尤其在对待满蒙关系和满朝关系方面，皇太极纵横捭阖，恩威并用，使清

朝的战略处境由被明朝、蒙古和朝鲜三面包围，反客为主为三面合围明朝，从而为清朝入关、建立起一个东北亚的多元大帝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清战争伊始，明方无疑占有着明显的优势，但清方却后来居上，一举跃居为东北亚第一军事强国，其中既有一些客观原因，也是明清双方各自境况发展的必然态势。从个人因素来看，明末的几任皇帝，诸如万历、天启和崇祯，既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才干相差甚远，而清方的军队和单兵素质，也远远超过明方的军队和单兵素质。当明方逐渐丧失其火器优势时，时移势易，此消彼长，就是战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比如皇太极以八年的时间收服祖大寿，即显示出非凡的气度和耐心，与崇祯的刻薄寡恩、多疑滥杀形成鲜明的对比。而明军内卷，诸如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也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后金入塞，袁崇焕之死，吴桥兵变——吴桥兵变则成为明亡清兴最具有“承上启下”功能的历史时刻，前后勾连起数个历史重大节点，其间因果相连，环环相扣，如同推倒了多米诺骨牌，最终导致了大明王朝的轰然倒塌。

张明扬是从“器”和“人”的两个方面，

□王淼

来总结明亡清兴的原因的：器，具体说就是火器，明朝本以火器见长，却被满清“夺其长技”。所谓“凭坚城，用大炮”，原是明军守城的基本理念，然而吴桥兵变之后，明清火器强弱易势，成为明亡清兴重要的转捩点。人，具体说就是人和，亦即“胜利者联盟”。从建州统一女真各部、实现满蒙一体、征服朝鲜，到辽人和辽东军功集团的先后降清，满蒙辽最终结合成一个强有力的利益共同体，跃升为东北亚压倒性的军事强权，而与之相对的明朝则“茕茕孑立，在形影相吊”走向王朝末路。

诚如张明扬所言，后金的崛起，乃是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东北亚最大的地缘政治事件，其间既有筚路蓝缕，也有昏招迭出；既有拨乱反正，也有神来之笔。明朝之所以灭亡，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却决不可能与后金的崛起毫无干系，更不应该成为后人研究明史，却忽略“清兴”的理由。张明扬的《入关》强化“清兴”的内容，淡化明朝的政争，既可看作清朝的开国史，从中也不难窥见明朝灭亡的原因。而突出清方在明亡清兴中起到的作用，让后人更全面地认识到明朝灭亡的原因，恰恰正是张明扬写作《入关》的目的。

□赵昱华

一个时代的人产生了“红薯恐惧症”。而在生产力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红薯不再成为餐桌上主食的替代品后，对口味的追求使其得以摇身一变，以新生代零食的身份重返舞台。

这并非红薯最早的“零食化”，像番薯片、番薯枣这样的零食，在作者的童年就已存在，这是跨越时代的传承。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革新”，既让这些传统的零食得以跨越阶层，走进千家万户；又得以诞生出了一批“新生代”零食适应全新的时代。

零食产业的发展暗合着社会的发展，适应着社会的需求。可以说，零食的发展同社会的发展是步调一致的：既有传承，将深厚的文化底蕴暗藏其中，在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过程中悄无声息地发扬光大；也有革新，或是取之于外，或是变之于内，在对美好的追求中化蛹成蝶。

这部《零食里的中国》，虽然采取的是私人视角，但正如作者在序言里所说的，“个人的即是社会的”“私人的即是公共的”，而零食作为文化记忆的载体的普及性，使得“我的零食故事”足以成为大家的零食故事，我的，是你的，也是他和她的，这是我们中国人共同拥有的一部别史。

□刘昌宇

了相应的研究和训诂补充。五位大师从最初的“一、元、天、丕、史”等单个字讲起，既追溯这些字的古义，又讲述它们的现今之义；针对一些意蕴丰富的甲骨文，则重点揭示它们在千年流变中的衍生之意。殊为难得的是，他们还依据出土文物和一系列考古新发现，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对《说文解字注》中的一些错解、误解或漏解之处，进行了系列勘正，并予以科学的解读，充分展现出中华汉字深沉博大的精神气韵。书中，马识途则在打捞记忆的基础上，按照“字以类聚，物以群分”的原则，解析了包括“人”“大”“太”“立”“天”“文”“周”等近30个常用汉字的甲骨文书写和象形意义，使根深叶茂的汉字文化，进一步凸显出它的时代价值。也让人欣喜地看到，中国古汉字的千年流韵，正在当代得以传承。

《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堪称一本厚重的大书，它将情感阅历与时代记忆有机融入一体，于笔墨流淌中，悉心勾勒了一幅中华汉字的别样风景，呈现出一个中国作家对汉字文化发自肺腑的仰慕。

# 零食，一部微观社会史



童年是美好的，我们的回忆经常伴随着零食的甜香。但是，可能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的零食记忆反映着社会的面貌，关乎着时代的变迁。

这部《零食里的中国》，正是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的。作者王金玲任职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写这本书的初衷，当然带着一种社会学的目的，但是，该书与我们常见的社会学著作有些不同，作

者没有做广泛的田野调查，而是围绕着“我的零食”“我的记忆”而展开，所以，它带着鲜明的散文化的特征，而学术气息较为清淡，并不做理论上的深挖。

书中收纳了共计116种零食，其中，有我儿时的回忆，像是彩虹糖、葵花籽、巧克力等；也有我从未品尝乃至闻所未闻的枇杷梗、酸妹妹、印糕等。王金玲出生于1955年，而我出生于2001年，我和她之间已然隔了一代，那么，三代之间的零食有哪些差异呢？是否足以反映时代的变迁和传承？

书中提及一道浙江独有的特产：霉干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不喜欢吃霉干菜的，这道菜颜色暗黑诡异，而且，闻起来太奇怪了，让我不由得心生恐惧。直到高中独自上学时，学校的食堂实在让人厌倦，我尝试了路边的霉干菜肉饼，我才发觉霉干菜独特的风味。该书也解释了一个我多年来的疑问：霉干菜明明不“霉”，为何被冠上了此名？原来，这背后竟然蕴含了绍兴的文化意蕴。这一种零食，也是几代人之间的共同回忆。

共同的回忆反映出的，是几代人之间的历史传承。但独有的零食，却反映出了时代的变迁。

作者提及她小时候的一道零食：“酸妹

妹”，我未曾见过，读后才知原材料是一种我家楼下花坛里就有的小草：酢浆草。这种三叶的小草曾经是我小时候的玩具，但我从未产生过吃的的想法。想来，采摘野草作为零食，也是那个物资匮乏时代独有的特色吧。

物资匮乏的记忆早已远去，但旧时代的回忆并未退出历史的舞台，而是蜷缩于舞台的一隅，等待着有心人的发现。王金玲正是这样一位有心人，正如她儿时发现“酸妹妹”“香蕉皮”这样的自制零食一样，在时隔三十五年之后的异地，她再度发现了自己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最喜爱的零食——肉松。

零食的选择，是带有浓厚的时代背景的。零食，顾名思义是一种在主食之外的额外补充，烤红薯是一种备受当代年轻人（包括我在内）喜爱的零食，但却并未让作者收录到“她的零食”之中。我想，其中的原因，足以说明这六十年来生产力的进步所带来的思想变迁。

红薯是一种高产的作物，正因如此，红薯在那个物资短缺的时代，有着半主粮的地位，然而，过高的淀粉含量和粗糙的口感，以及红薯带来的尴尬，让经历过那

# 流淌在记忆深处的悠悠汉字情



《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是文化巨匠马识途第一部关于甲骨文研究的著作，也是一部面向普通大众鲜活生动的甲骨文科普读物。书中既生动呈现了西南联大课堂的教学的帧帧画面和一代学术大师们的群像风采，又从不同角度展现了片片甲骨文的独特魅力，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兼具文学性、知识性和趣味性。

在当代文坛，马识途是一位才思敏捷、创作活跃、成就卓著的老作家。他自少年时代起便投身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后长期从事艰苦的地下党工作，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文艺事业不懈奋斗。其代表作《夜谭十记》中《盗官记》曾被改编成电影《让子弹飞》而广为人知。到了晚年的马老依然辛勤笔耕，以其敏捷的思维、惊人的记忆，开始投入到关于甲骨文、金文等在内的古文字研究中，撰写了这部《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全书包含上、中、下三卷。上卷为“马识途西南联大课堂拾趣”，中卷为“马识途甲骨文拾忆”，下卷为“马识途说文解字”。

1941年，马识途考入由清华、北大、南开联合成立的西南联大文学系，师从于罗常培、唐兰、闻一多、王力、陈梦家等5位大咖，他们都是当时国内语言文字学方面的领军人物。马识途选修了唐兰“说文解字”及“甲骨文研究”两门课程，他还跟陈梦家学“金文”（铜器铭文）。课堂上，五位大师倾力相授，使马识途在文学创作和文学训诂

学等方面都受益匪浅。如今，80多年过去了，几位恩师的授课场景和翩翩风采，仿佛在时光的深处又鲜活起来。罗常培的惜才和爱才，唐兰的博学和深刻，闻一多的爱国和担当，王力的专注和热情，陈梦家的豪放和洒脱，都给马识途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唐兰的第一堂课，借着“东西”二字的解读，既准确诠释了汉字的一词多义，又广泛联系当时的时局，一语双关地针砭了旧中国阴暗的政治局面，令人莞尔。在篆额西南联大的“三绝碑”时，闻一多有意把“立”字写成一个正面立起来的人；把“联”的耳旁写成一个真耳朵样子，把“大”字写成一个正立人的做法，则有力彰显了他的凛然风骨。此外，罗常培对马识途寄以厚望，希望他赓续中华传统文化的描写，虽然在书中着墨不多，但每每读来，同样让人为之动容。

全书不单单有对恩师的缱绻追忆，还有马识途对意蕴精深的中国古文字上的探究。他不仅将唐兰先生等对甲骨文的研究观点和成果都记录了下来，而且自己也作